

司馬遷年譜

k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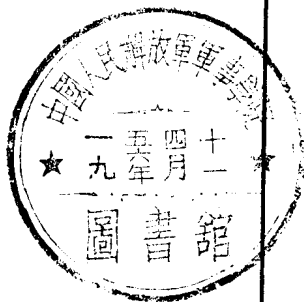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5 1517 9

鄭鶴聲編

司馬遷年譜

商務印書館



# 司馬遷年譜

鄭鶴聲編

★版權所有★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

(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)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

(91734)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56/16

1933年9月初版

印數 1—2,500

1956年2月重印第1版

1956年2月上海第1次印

定價(7) ¥0.58

## 重版說明

本書以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爲藍本，並徵引其他典籍中的有關記載編寫而成，對於司馬遷的不朽名著史記及朋輩交游亦有論述，在司馬遷生平事蹟的考證方面，提供了一定的資料。當紀念這位偉大歷史學家誕生二千一百周年之際，特予重版，以供歷史研究者參考。重版前曾由作者增撰「導言」，對於司馬遷的創造精神和卓越成就作了概括性的介紹；內容除個別字句有所修正外，基本上未加更動。由於本書編寫於二十多年以前，立場、觀點、方法不無值得商榷的地方，有些引用的材料也沒有足夠的分析批判，因此希望讀者當作一本資料性質的參考書來閱讀。

關於司馬遷的生年，目前還存在着不同的說法，請讀者參閱「歷史研究」一九五五年第六期以及本書附錄司馬遷生年問題商榷。

商務印書館

## 重印司馬遷年譜導言

司馬遷爲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，他那部卓越的著作——史記，不但對於我國史學界起了轉變方向和推進歷史研究的作用，就是對於全世界，尤其是在東方各國的史學界來說，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。蘇聯史學工作者曾經這樣地稱頌他：「古代中國的歷史知識，較其他東方各國獲得更大的發展；在紀元前六——三世紀，古代中國就有了最初的一些歷史著作。敘述從遠古時代到紀元前二世紀的中國史的第一部著作，是古代最偉大思想家之一，司馬遷（紀元前一四五——八六年）所著名爲史記的書。」（蘇聯大百科全書歷史）他們把司馬遷和歐洲多少世紀被稱爲「歷史之父」的希羅多德相提並論，可見他們是如何尊敬這位有功於人類文明的偉大人物了。

司馬遷的人格是偉大的，成就是卓越的。他是一個富於正義感、人民性和革命性的人物，具有熱愛祖國、愛好祖國歷史事業和善於批判歷史事實的精神。

首先就他熱愛祖國一點來說：

司馬遷本是「耕牧河山之陽」的一個樸素而且優秀的農村青年，自從幽美的農村——龍門，走到繁榮的首都——長安的時候，就想拋棄那貴族式的宮庭享受，從自己的崗位上，發揮他自己的力量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這便是如他自己所說：「絕賓客之知，亡室家之業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務一心營職」的情況。（報任安書）

當他二十歲的時候，隨着祖國新興事業的發展，就開始了遊歷全國的壯舉。在這度大遊歷中，首先是「南游江淮」，「上會稽」，「探禹穴」，「闕九疑」，「浮於沅湘」，「北涉汶泗」，「講業齊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嶧」，「戾困鄱、薛、彭城」，「過梁楚以歸」。在這個遊歷階段中，進行了「講業」「鄉射」等各種文化教育事業活動。於是乃「仕爲郎中」，又開始了第二度的遠行。在這次正式奉使中，更重要地負起了訪問西南少數民族的任務，就是所謂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印笮昆明」。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到他「還報命」的時候，司馬遷已是一個壯年的歷史工作者了。他在這些遊歷過程中，因爲接近了

各個階層的人民大眾，歷覽了名山大川，多識禽獸草木之名，所以實際上認識到祖國的偉大，更加强了他對於祖國的熱愛。

歷史科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，是在指出新社會關係的成長。司馬遷是最愛祖國新鮮事物的一個人，他對於新興事業，特別感到興趣。在各項新興事業中，他是注意了全國農虞（礦）工商事業發展的情勢，尤其吸引他的注意力的，便是當時全國水利建設事業的情況。水利事業的建設，積極擴大了農田灌溉的面積，促進了農作物的生產。他在親身考察的過程中，深刻地體會到水的利害關係，並且參加了治河的勞動工作，因而撰成空前的河渠書。據他自己說：「余南登廬山，觀禹疏九江，遂至於會稽、太渚；上姑蘇，望五湖，東闕洛、汭，大邳，迎河行淮、泗、濟、漯、洛渠；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，北自龍門，至於朔方。曰：『甚哉！水之爲利害也！』余從負薪塞宣房，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。」（史記河渠書）這個最富有現實意義的偉大篇章，以後成爲水利方面的古典文獻，歷來治河的水利工作者，常從這裏吸取治理黃河的經驗和教訓。

其次，就他愛好祖國歷史事業的一點來說：

司馬遷父子都是愛好祖國偉大的歷史事業的，同時也很關心現實政治。據司馬遷自己說：「是歲（漢武帝元封元年）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（指司馬談）留滯周南，不得與從事，故發憤且卒，而子遷適使反（從訪問西南少數部族歸）見父於河洛之間。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：『余先周室之太史也，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，典天官事，後世中衰，絕於予乎？汝復爲太史，則續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，是命也夫！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爲太史，爲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……自獲麟以來，四百有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，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爲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』」遷俯首流涕曰：『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。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這便是司馬遷承受他父親的遺命，而企圖撰述史記的開端。在這段沉痛的對話中，充分表現了他們父子愛好祖國歷史事業的心境。

但在司馬遷撰述的過程中，不幸遭受到無情的迫害。他在「身毀不用矣」的遭遇下，對於他父親臨終的遺命以及獻身於歷史事業的壯志幾乎不能貫徹了，在這種艱苦環境裏，他終於毅然決然地打開生路，採取了古來聖哲「發憤著書」的前例，來鞭策自己，再度鼓起了他爲祖國歷史事業而奮鬥的勇氣。他認爲「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囚姜里，演周易；孔子厄陳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膺腳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。」因此，他終於勇敢地舉起筆來，「述往事，思來者，卒述陶唐以來，至於麟止，自黃帝始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完成了這部傑出的作品——史記。表現出「有志竟成」的典型例子。

再次，就他善於批判歷史事實一點來說：

春秋公羊學派的治學方法，本是好談名理的，本是富有批判地精神的。司馬遷是繼承了董仲舒公羊學派這種善於批判的精神。同時司馬談也是一個好論事理的歷史工作者，

當他臨卒的時候，曾三番兩次地囑咐司馬遷必須運用批判的方法來處理歷史的事實，例如他說：「爲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載矣。」「余爲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」之類，所謂「論」就是屬於批判的範疇；所謂「載」就是屬於記錄的範疇。綜而言之，是想把理論與事實結合起來的。

司馬遷的批判方法，大體說來，是有「褒揚」和「貶斥」兩方面。他對於這種批判方法的運用，是多樣化的。因此，由於春秋一字褒貶的方式，發展而爲史記全面褒貶的方式。這正是他論載史事的一個特點，而劉知幾評稱：「夫論者，所以辯疑惑，釋疑滯，若愚智共了，固無俟商榷，丘明君子曰者，其義實在於此。司馬遷始限以篇終，各書一論，必理有非要，則強生其文。」因此他認爲「史論之煩，實萌於此。」（史通內篇論贊）這顯然是對於司馬遷運用批判方法的一些誤解。

司馬遷的論贊，並不限於篇末，而是隨人隨事，發揮其意見，所以往往散見於各篇之中，就是採用後人所謂「夾敘夾議」的敘述方法。顧炎武嘗說：「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論刺，而於

序事之中，即見其指者，惟太史公能之。平準書未載卜式語，王翦傳未載客語，荊軻傳未載魯句踐語，鼂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，武安侯田蚡傳未載武帝語，皆史家於敘事中寓論斷法也，後人知此者鮮矣。」（日知錄史法）這正說明了司馬遷善於運用批判方法的事實，因爲如此，才能引導讀者從這些地方去吸取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。

尤其值得我們尊敬的，便是司馬遷是一位最富有正義感、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史學家。他對於歷史人物褒貶的一個標準，就是以人民利益爲出發點。因此他一方面褒揚了那些農民起義的領袖和英雄人物如陳勝、項羽等，一方面又指斥那些虐待民衆的人物如蒙恬兄弟和武健嚴酷的官吏。項羽、陳勝等英雄人物在其他抱持封建統治正統觀念的史學家看來，只不過是一些叛逆分子，無論對秦對漢，都是沒有他們的地位，而司馬遷不但把項羽列入本紀和秦始皇帝、漢高祖相提並論，而且頌贊了項羽優秀的傳統和偉大的人格說：「吾聞之周生曰：『舜目蓋重瞳子，』又聞項羽亦重瞳子，羽豈其苗裔邪？何興之暴也！夫秦失其政，陳涉首難，豪傑竄起，相與並爭，不可勝數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勢起隴畝之中，三年遂將

五諸侯滅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號爲霸王，位雖不終，近古以來，未嘗有也。」（史記項羽本紀）既然承認項羽是一個近古以來未嘗有的人物，自然就高出秦漢的兩位大皇帝了。他又不但把陳勝列入世家，和孔子並稱，而且推崇陳勝建立了革命起義的首功，說「陳勝雖已死，其所置遺侯王將相，竟亡秦，由涉首事也。」（史記陳涉世家）來表示陳勝永存不朽的革命精神。至於他指斥蒙恬兄弟所以遇誅由於輕視民力的罪行說：「吾適北邊，自直道歸，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，鹽山煙谷通直道，固輕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併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夷傷者未瘳，而恬爲秦將，不以此時力諫，振百姓之急，養老存孤，務修衆庶之和，而阿意興功，此其兄弟遇誅，不亦宜乎？何乃罪地脈哉？」（史記蒙恬列傳）又指斥了武健嚴酷的官吏說：「昔天下之網嘗密矣，然姦僞萌起，其極也，上下相遁，至於不振。當是之時，吏治若救火揚沸，非武健嚴酷，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，言道德者溺其職。」（史記酷吏列傳）這些都是表現了司馬遷富有正義感和人民性的偉大精神。

綜之，司馬遷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是很多的，他的偉大精神和實際貢獻，都是值得我

們學習的。雖然他的歷史著作組織嚴密，敘事翔實，是富於科學性的，但也時常流露出某些相信天命鬼神以及報應循環的論調，對於歷史事實作出某些偏面的了解，但這些缺點都是受了時代的限制，是不足為病的。我們不但不能把這些缺點來責備司馬遷，恰恰相反地，我們應當把補救這些缺點的責任，放在我們自己的肩上。毛主席曾經這樣教導我們：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，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，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，另一方面，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，限制了人們的眼界。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，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，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——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，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。」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八二——二八三頁實踐論）因此，我們紀念這位具有國際性的大史學家司馬遷，固然要努力去學習他的偉大的創造精神，並進而發揮我國過去歷史學上的優秀傳統，但更重要的，還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，更進而推動我國歷史研究的工作，使我國研究歷史的工作，迅速地走上歷史科學的軌道，而向前猛進。

最後，應當說明的，就是這部司馬遷年譜，是一九二九年寫成的，照道理說，應當徹底加以改編才好，但因適逢司馬遷二千一百年誕生紀念之辰，時間促迫，只做了局部的修訂。因為這部年譜中都是羅列材料，缺乏理論的發揮，所以把司馬遷偉大的精神和卓越的成就，作了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明。希望讀者們予以指正。

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於青島山東大學

## 小序

占中國歷史上極重要之位置如漢司馬遷，後人讀其書者衆矣，然未嘗有能詳知其爲人，而爲之年譜者。有之，自海寧王國維氏太史公繫年考略（刊廣倉學窘叢書中）始。嗣後武進張惟驥因糾繫年考之謬，再爲太史公疑年考，（一九二八年三月小雙寂庵刊）然寥寥千百字而已。

據王氏太史公繫年考略：以元封三年太史公年三十八爲太史令。應生孝景帝中五年丙申，據張氏太史公疑年考：以太史公自序元封元年年二十仕爲郎中推之，則元封三年年二十二爲太史令，實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壬子。王氏以太史公卒年絕不可考，約卒武帝末昭帝初，爲六十歲左右，其受腐刑，則在天漢三年，年四十八。張氏則謂實卒於武帝後元元年，年四十二，其受腐刑亦在天漢三年，年三十二。此兩書不同之大較也。

本書以王氏繫年考略爲藍本，而旁稽他籍，爲之佐證。王氏治學，考覈尤精，其大體無誤，

與余所見雖稍有出入之處，亦爲辨證。非別有正確之發現，不敢立異，徒滋紛擾。張氏惟驤謂於學問一事，素不與人持同異，考據之學，更不容有兩歧。祇以王氏所考太史公行年，頗有舛誤，故復考之，成此疑年一篇，非相左欲相成也。然就余所見，張氏考釋，頗多奪理，反不若王氏以謹嚴態度，爲之辨證。故於張氏之說，皆所不取。

考據一人之事蹟掌故，得之於當時人或當地人者，最爲可據。司馬遷作史，卽多用此法。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等，皆爲本書第一等史料，採擷甚多。王氏似未甚注意。又司馬遷爲漢左馮翊夏陽人，卽今陝西韓城縣，則於韓城縣志同州府志等書，其所採搜，於史公爲本地文獻，較爲詳備，并可信也。茲擇其雅正者錄之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自識於南京

## 司馬遷年譜

晉書宣帝紀：「司馬氏，其先出帝高陽之子重黎，爲夏官祝融，歷唐虞夏商周，世序其職。及周，以夏官爲司馬。其後程伯休父，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，錫以官族，因而爲氏。」（晉書卷一）元和姓纂：「司馬，重黎之後，唐虞夏商，代掌天地。周宣王時，裔孫程伯休父爲司馬，克平徐方，錫以官族。在趙者曰凱，以傳劍論知名，蒯瞶其後也。在秦者司馬錯，孫靳，靳孫昌，生無憚，無憚生喜，喜生談，太史公，生遷，漢中書令。」（元和姓纂卷二據祕笈新書改）新纂姓氏箋釋：「司馬，河內郡，支出程氏。周程伯休父爲周司馬，以官爲氏。」（姓氏箋釋卷七）案鄭樵作氏族略，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，或以國爲氏，或以邑爲氏，或以官爲氏，或以族爲氏，或以國爵爲氏，或以族系爲氏，雖類別繁複，而源流井然。以官爲氏者，太史、太師、司馬、司空之類是也，雲氏、庾氏、籍氏、錢氏之類亦是也。（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）然司馬氏之族，本出於程，至周宣王時而後定。據司馬遷自序，則謂出自程伯休父，惟鄭樵謂晉有司馬卹、司馬彌牟，